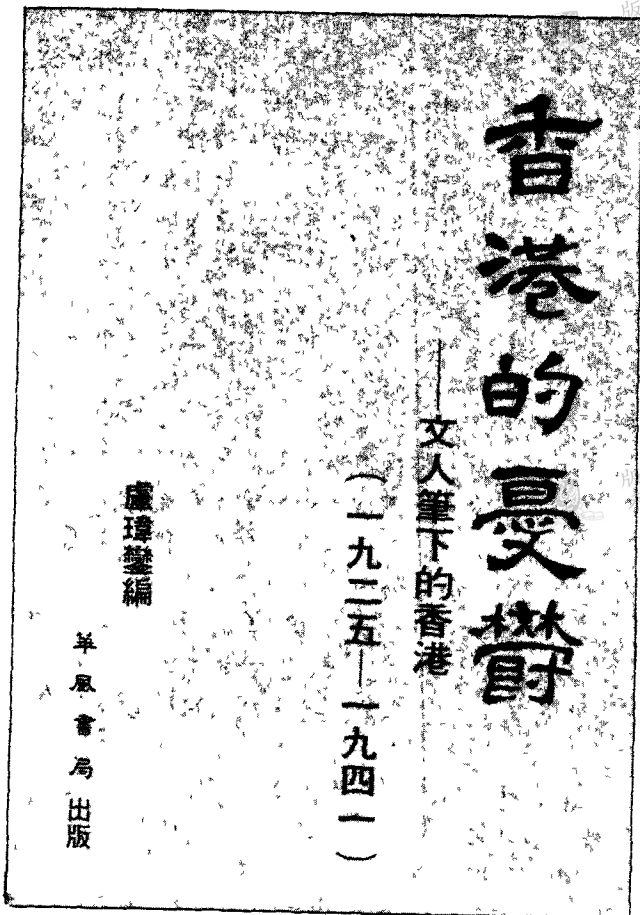


張灼祥、盧瑋鑾對談：

「香港的憂鬱」



曹綺雯整理

張：「香港的憂鬱」是一本很特別的書，你在序中說：「香港是一個命運奇異的小島，百多年來，承受了無數中國人的血和汗，愛和憎，但她却受着外人的管轄。」可能由於香港接近祖國的大門，為政治，經濟帶來很大的方便，每遇上國內有甚麼大變動，香港有很出人意的包容力量，接納從祖國來的人。但這些過客對此暫居之地，總是很多愛少，便形成了香港的悲劇性格。」又說：「許多人寫香港，總忘不了稱許她華麗的都市面貌，但同時也不忘挖她的瘡疤，這真是香港的憂鬱，近年來，她竟得到前所

未有的關懷，是禍是福，現在難下定論，但不慣接受關懷的她，顯然是驚惶失措了，恐怕這也是另一種憂鬱。」

「香港的憂鬱」收錄了四十八篇作品，包括了詩、散文、雜文、遊記。其中著名的作家不少，有聞一多，魯迅，巴金，田漢，胡適，穆時英，許地山，蕭乾，袁水拍，柳存仁，胡春冰和徐遲等。當然，在現在看起來，一些作者究竟是作家或是普通投稿者已弄不清楚。但無論如何，看完這四十八篇作品，對於香港四十、五十年前的歷史，多少會有點認識。

請問你編選這本書目的是甚麼？

盧：事實上，這本書應該是我的研究的副產品，因為這七八年來，我在研究一個課題：幾十年前中國的文化人來香港的活動情況。但這些資料很散碎，我必須從當年的報章、雜誌或作家的作品中，找出一條條的資料。在此情況下，我必然會讀到很多他們的作品。很可能他們並非作家，但若提及香港，我也會留意，蒐集下來，便寫成我研究的論文。有些作為原始資料的作品在論文中用不着，可是，當中却有許多珍貴和有趣的記錄。有一次，跟一位出版界的朋友談起，我問他：「你知道嗎？幾十年前文化人經過香港時，看見香港的問題，有些跟我們現在所看見的很相同，有些又很不相同。」他當時很好奇的叫我拿出來看看。他這偶然一說，我想，倒不如編出來讓大家一起看。

張：幾十年前的作品，在蒐集資料和編輯的過程中，一定遇到很多困難，可否具體地談談？

盧：我不談蒐集資料的困難了，因為在七、八年中，所遭遇的實在太多，至於編書時的困難，也是預料不到的。有幾百篇有關香港的作品，我要選其中一些既有代表性，又有特殊的意念，又是著名作家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不要讓別人有一種印象，以為只是一面倒的，偏見的選擇，故意利用這些作品來反映自己個人的某些意念。所以，我開始在這幾百篇作品中選擇時，首先希望把各方面均能展示在讀者面前，例如社會狀態，交通情況，生活細節，文化，教育等等。所以，我必須細心地去選擇，但選得適合的材料，有時又可能嫌文筆太差，在此情況下，我便先要做若干次的選擇功夫。此外，因當時來香港的文化人，在當時來說，部份是較偏激的，使得他們所看見的都流於片面，而對一個外來人或過客來說，也很難深入了解香港情況的。我現在所選的可能有些片面的意見，

如果讀者不明白背後的原因，還以為我有意選一些片面的作品，這是我所擔心的。幸好總算勉強強能夠將有代表性的作品都選出來了。以上都是一些我覺得最難處理的問題。

張：看完這四十八篇作品，對四、五十年前的香港，多少有了概括的認識，聽說出版後有不少反應，當中更有些很難忘的。

盧：我出版這本書的原意是讓大家看看過去的香港給人一個怎麼樣的印象。怎料出版後，反應來自不同身份的人，例如我的一位學生，看後立刻打電話向我說：看完後好像上了香港歷史的一課，還問我過去的香港是否真的如此。言下之意，頗感疑惑。此外，最令我難忘的是一位讀者，他寫信給出版這本書的書局，他說：「真料不到事隔幾十年，竟然在此看到我一位老朋友的作品，我實在希望知道，你手上還有多少這個人的作品，因為我們要紀念他。」一問之下，原來該讀者是這書內所輯的一位詩人彭耀芬的朋友。彭耀芬早已去世，而他留下了很多作品。現在恐怕沒有人記得他了，他的朋友不知道該往那裡尋回他的作品。我相信他的朋友現正努力地蒐集，要將他的作品公諸於世了。

張：說起彭耀芬，我聽你說過，他是一位很特別的人物，他是香港第一個被遞解出境的知識份子。

盧：彭耀芬在一九四一年被遞解出境，那時他才十八歲。他自一九三八年始，已不斷寫詩，投稿到有名的報章副刊上，特別是當時很著名的「立報」副刊「言林」及「大公報」副刊「文藝」版。他是熱血青年，而當時香港社會不容許有這麼「熱血」的說話，他却竟然寫了這一類的詩。終於在一九四一年觸犯了香港政府的條例，將他解上法庭，審判之後，被遞解出境。我一直不知道他到了哪裡去，我曾向多人探問，但都不認識他，現在他的朋友告訴我說，他被遞解後到了澳門，後來偷渡返回香港，住在新界，可惜過了一年後，不幸患急症死了。

張：讓我們看看香港的憂鬱中的一篇作品，是友生寫的「香港小記」。這篇文章沒有太大的特色，概括寫出香港一般的建築、道路。但文中開始時有兩句話，說：「吾國人：居留與遊歷香港者為數甚多，凡有血氣之倫，不少當有兩種感想：一則舉目有山河之異，無限慨憤，二則我國無物質之能力，不勝慚愧。」我看完此書，亦感到許多作者，很自然地，不謀而合地表達

了這種意念，一種過客的心情，對香港有點兒憎恨，對它總是諸多批評。而香港的物質生活又確實比當時的中國大陸勝了一籌。友生這篇文章寫於一九三四年，五十年前的一些感受，談及香港人那種過客的心情到現在依然沒有改變，你認為怎樣？

盧：我編這本書時就有這種感覺。為什麼幾十年前，一些由外地來香港的人，所感覺到的香港，竟跟幾十年後的今天沒有一點分別，不過，我覺得這也是十分容易理解，因為當年由國內來的人，認為自己是從一片大地來到這小島上，心理上認為香港只是一個殖民地，文化水平和國際地位都很低。但反觀香港的建設，物質享受，又比當時的國內好得多，這種心理，在當時來說，當然很清楚，至於現在，更毋須解釋了，多少有些相同罷。

張：另外要談的一篇是穆時英的作品，他早期寫了很多小說，是個很特別的小說家。他來港後，不寫小說，也不是一個記者，但他這篇文章中，却看出他對當時的香港觀察入微。他提及一個有關老虎的傳說，現在聽來也很有趣，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有點象徵的意義。現在，先看穆時英怎樣寫這個老虎的傳說：

「一九三三年冬天，香港的報紙在最觸目的地位詳細地記錄著九龍半島的獅子山的虎患。這消息是由香港警察局正式發給各報館的，而且連續登載了一星期。起先只是發現虎爪的痕跡，後來農家的豬在半夜上被吃掉了，樵人被咬傷了，最後連週末旅行者也失蹤在獅子山的森林裏邊了。做慣順民的，膽小的香港人，嚇得再也不敢到這一帶風景區去野餐。香港政府派了許多警察去防守，禁止任何人接近這危險區域；可是英國陸軍部派來的工程師却每天一早便跑上去，到晚上才油污滿面，精疲力盡地走下來，山上還任着幾個工人。過了兩個月，老虎的傳說漸漸消隱了，誰也不知道這故事是真的還是捏造的，然而有一件事却是真確的，山上已經縱橫地鋪滿了不准通行的軍用公路，山巔也圍了電網。據附近的居民說，工人每天晚上都在往山上搬運十六寸口徑的要塞砲。」我看過一些香港掌故的書，知道戰前香港山上曾出現老虎，但看完穆時英這篇文章後，却給予我另一種感覺，原來在老虎傳說的背後，好像有些古怪事兒。你看完這篇文章後，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感受？

盧：首先，我真料不到穆時英會寫一篇這樣的文章

，因為穆時英一向是寫小說的。忽然一本正經地蒐集資料，十分詳細地說出香港各種軍事據點的實際情況，令我感到十分驚訝，我幾乎不相信是他寫的，但文章前部份又有些很感性，很詩意的句子，證明尚有些他的影子。至於老虎的傳說，我翻閱報紙時並不單只看文藝版，也包括港聞版，我看到一連幾個月，港聞版都刊載了老虎出現的新聞，我便當作一則普通的新聞看待。看到穆時英這篇作品，我才領悟，原來老虎出現的背後，實際上想香港人不再到郊外去，以免干擾政府的軍事建設，從這篇文章，我們說穆時英「心水清」也可以，說他掌握了一些比較重要的資料也可以。

張：這篇文章的確很特別，很少作家好像穆時英那樣，詳細分析香港的軍事設備，甚至直言香港是一個不能防守的城市。

盧：果然給他不幸言中。

張：我們談談另一篇文章：「香港的憂鬱」吧，這篇你選作書名的文章，雖然已經是五十年前的作品，但看起來跟現在分別不大。讓我們先看看適夷怎樣描述香港的憂鬱：

「參雜在雜沓的人群中，看着電車和巴士在身邊疾駛而過；高坐在電車的樓座裏，看看那紛攘的街頭，這兒雖有一點近代文明都市的風味。但是抬起頭來，看見對座的一些頹頹打扮畢挺的先生，捧着一張印刷惡劣的小報，恬然無恥的讀着淫穢的連載小說，心頭便感到荒涼。

。從九龍夜歸的渡輪上，望着燈光璀璨的山島是美麗的：乘高纜車登上高巔，在南峰的秋風裏，瞻眺蒼茫雲天中星羅棋布的島嶼，點點的魚舟好似風在青空，可是遠遠地却聽見一聲聲試砲的聲音，就禁不住惆悵了。」

這篇作品說出了一些香港的憂鬱，你有沒有需要補充的地方呢？

盧：我想，當時適夷的身份較特別，因為他是負責抗日宣傳工作的。他從另一個角度去看香港，的確覺得香港有憂鬱。

張：再看看許地山寫的「一年來的香港教育及其展望」，其中提出不少香港教育的問題，例如課程的差異，投機的教育，學習環境的惡劣，管理的問題，語文教育政策，與及香港大學貴族化，使貧窮子弟難以就讀，這包括考試課程及學費的昂貴，我看完後，覺得許地山這篇文章，若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只是平平無奇。但是，你好像有不同的看法，對嗎？

盧：不錯，我聽見你說這篇文章平平無奇，我不禁

替許地山叫屈，因為在今天寫這樣子的文章，真的不值一提，再尖銳些的文字也司空見慣，特別是批評教育制度，批評政府的。但在當時來說，我相信這篇文章的出現，都需要經過很多轉折，例如文中有許多××的地方，即經過政府的審查，有些句子就給抽驗了。你想，今天看來是平平無奇的文章，但出現於昔日，却是相當大膽及切中要害。況且，他所提及的香港教育問題，在當時是不會有人提及的。

張：依你說來，這實在是一篇很特別的文章。他談及學習環境、語文教育的問題，在今日言之，仍有其真實的一面。許地山在篇末提及教育的目的，更值得我們深思，他說：「教育底目的在拔苦。拔苦底路向是啓發昏蒙和摧滅奴性。一切罪惡與墮落都是由於無理解與不自尊而來。教育者底任務是給與學生理智上的光明與養成他底自尊自由底性格。但這兩樣，現代的教育家未曾做到，反而加以摧殘，所以有用的人無從產生。」

在五十年前許地山提出這些問題，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發現問題依然存在，但其間是否已有了進步。

盧：我覺得不單教育方面。我們試從出版方面看看，我剛才說過，比這篇文章尖銳一百倍的文章，現在都可以出現在我們面前，但昔日却經過了那麼多艱辛。我想，這本書能夠給予我們很多種不同的啓示，其中我自己感覺得到的是：雖然有許多問題從幾十年前至今依然存在，但我們都有辦法將問題提出及希望改善。從這方面看，事實上已進步不少了。

張：這本書所編輯的文章，時期由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四一年，你是否打算繼續編下去，直至八十年代呢？

盧：這本來就是我的理想，但不知道能不能夠做到。我這話的意思是：意念本該很好，因為可以從過境的人怎樣看香港，一直編到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怎樣看香港，我肯定這是很有意義的。但問題是讀者的反應，與及當我選取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作品時，選取的標準該怎樣訂定，所以我仍在考慮中。但我真的很希望能完整地將這幾十年來人們對香港的看法呈現出來。

張：編輯的第一本書叫做「香港的憂鬱」，希望編到八十年代時，名字會比較積極一點，愉快一點。

盧：我也希望如此。